

# 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

## 摘要

個人主義化論點源自揚棄「社會階級（階層）」模式的理論嘗試。社會階級的終結，實即「大團體社會」的終結，階級或其它大社會團體，對個人生涯史的类型力量減弱。提出較完整的個人主義化論點的是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及其夫人。個人主義化的現象是社會多元化及異質性的增強，及個人決定必要性的增加，但批判者認為，這些現象可用「機會結構的變遷」及「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而與個人主義化無關。個人主義化論題還牽涉到「(新)社會整合」，貝克夫婦認為，第二現代的「計劃式整合」有別與第一現代的社會整合。在詮釋過貝克及其批判者的論點後，本文作者將提出兩個可繼續討論的觀點：一、階級共同命運的消失，表示「個人主義化的社會分類」日益重要，「生活風格族」可作為新社會學的新研究課題；二、第二現代是一種新的理性主義，第二現代的「學習型理性」有別於第一現代絕對主義式的「控制理性」。

# 個人主義化與第二現代\*

\* 本文刊於《中國學術》第五輯（2001年一月）：pp. 262-291。

本文有關「社會不平等」之內容，係台灣國科會研究計劃「社會不平等理論的新面向 - 部份德國社會學者的新概念及新分析模式」(NSC 88-2418-H-009-001)的部份研究成果。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第二現代研討會」(政治大學社會系主辦，巨流圖書公司協辦；2000.6.23)，  
今文已有大幅增改。

孫治本

交通大學（台灣新竹）

## 一、前言 - 第二現代：現代解構後的再建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基於理性主義的「現代性」是否還能維持（甚至於是否曾經存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然而除了宣告現代秩序已經瓦解的後現代主義（盛行於法國及美國），80年代初起，另有一些德國社會學家，一方面承認現代解構的現象，一方面則試圖在理論甚至實踐上，嘗試現代的再建構工作。而自從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提出了「第二現代」（Die Zweite Moderne）一詞（Beck 1997: 25），雖然包含在此一概念之下的各種視野並非貝克所獨創，但以其在相關理論研究上的貢獻與影響力，我們很有理由以「第二現代」一詞表示「（第一）現代解構後的再建構工程」。<sup>1</sup>

後現代批評現代的理性主義、普遍化的理論概念，強調多元性、片斷性、不確定性（Best / Kellner 1994: 22）。後現代學者布希亞（Baudrillard）以「內爆」（implosion）的概念描述各種界限的崩潰，並宣稱「社會性的終結」（Baudrillard 1983；參閱 Best / Kellner 1994:

---

<sup>1</sup> 貝克於1986年出版其成名作《風險社會》，以「另一種現代」（die andere Moderne）一詞指涉當代先進社會有別於舊有現代的兩項特質：高風險與個人主義化；1990年，他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德國社會學者大會發表開幕演說，題為「兩個現代間的衝突」（Der Konflikt der zwei Modernen）（Beck 1991: 180-195）；1997年，他出書探索另一項當代特性—全球化，開始使用「第二次現代」一詞（Beck 1997: 25），並為Suhrkamp出版社編纂一系列「第二次現代叢書」（Edition Zweite Moderne）。

150-155 & Smart 1997 : 69-74 )。而社會學是與現代性同時出現的 ( Smart 1997 : 53 )，現代性的終結即等於社會學的終結。德國社會學界對後現代主義不感興趣，兩者間的對話很少。然而，在德國發展出的「第二現代」思潮，可以說是（第一）現代理論與後現代理論之外的「第三條路」；第二現代不論是與第一現代或後現代，均有相同、相異之處。

第二現代與第一現代一樣，均重視人的理性；但第二現代與後現代相同之處是，第二現代亦覺察到現代性的解構，且強調多元性與不確定性。然而，後現代的反理性主義精神，使其被視為一種虛無主義 ( Best / Kellner 1994 : 22 ; 黃瑞祺 2000 : 219 )，研究現代與後現代的學者黃瑞祺說：「後現代蘊含一種焦慮不安、沒方向、迷惑等感覺。．．．不知道朝甚麼方向、甚麼目標前進。」( 黃瑞祺：2000 : 219 ) 第二現代則企圖找出方向。在指出第一現代解構的事實後，第二現代思潮試圖在理論上甚至實踐上，進行再建構的工程。第二現代雖反對那種反歷史的現代性 ( 歷史之終結 )，但它並非反現代，而是要將現代歷史化，視現代化為「( 永遠 ) 未完成的現代化」。第二現代也反對線性思考方式，強調多元性與不確定性，然而它不是只停留在此，而是要追求「建立於不確定性中的多元秩序」。

綜觀各種第二現代思想，筆者認為，第二現代主要關注於三種第一現代的解構現象，並分別提出三種對策 ( 再建構工程 )，詳見表一：

表一：第一現代的解構與第二現代的對策

第一現代的解構	第二現代的對策
個人主義化 ( 第一現代社會整合的瓦解 )	新社會整合

風險社會的形成	提高風險與責任意識
民族國家的式微（起因於全球化）	跨國政治 <sup>2</sup>

在現代解構後的再建構過程中，「個人主義化」（Individualisierung）是表一所顯示的三個核心問題之一，它同時牽涉「社會團體的瓦解」與「社會再整合」兩個面向。然而此一論題的含義及其究竟有無新意，在德國社會學界引發了爭論。本文以下先談社會階級（階層）的終結與個人主義化，接著詮釋貝克夫婦的個人主義化論點，然後介紹一些批判者如何以「理性選擇理論」批評貝克的個人主義化論點，最後一部份一方面是筆者對以上正、反雙方的評論，一方面則從中發掘出一些重要問題，進行較有開創性的討論。

## 二、社會階級（階層）的終結與個人主義化

### （一）階級（階層）理論的困境

個人主義化論題其實發源自數位德國社會學者對傳統社會階級（階層）理論的批判，及對建立新的社會不平等模式的嘗試。以筆者所能搜集到的資料，最早是在 1982 年，克瑞可（Reinhard Kreckel）為文對所謂「垂直式的」不平等模式（即階級、階層模式）提出了批判（Kreckel 1982）。接著在 1983 年，克瑞可主編了《社會不平等》（*Soziale Ungleichheiten*. Göttingen）一書，其中收錄了貝克（Ulrich Beck）的一篇論文，題為〈階級與地位的彼岸？ - 社會不平等、社會

---

<sup>2</sup> 全球化的核心問題是民族國家的式微。當市場已無疆界，而政治仍只能在民族國家的範疇下運作時，（民族國家的）政治便無法規範全球資本主義，形成「政治失靈」的現象。解決之道是透過國家與國家的合作，讓政治也能跨國界運作，此即所謂跨國政治（參閱孫治本 2000a：149-155）。

個人主義化過程及新的生活形式及認同的產生 > ( Jenseits von Klassen und Stand? – Soziale Ungleichheit, gesellschaftliche Individualisierungsprozesse und die Entstehung neuer sozialer Formationen und Identitäten ), 將個人主義化與階級、地位的終結聯繫起來, 並提出「社會不平等個人主義化」的概念 ( Beck 1983 )。1986年, 貝克出版《風險社會—邁向另一個現代之路》( *Risikogesellschaft –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M. ), 其第二部份即題為「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工業社會生活形式的去傳統化」。隨著該書的熱賣, 個人主義化論題也越來越受到學界的注意。

個人主義化論題起源於對階級、階層模式的質疑, 而階級、階層的終結, 即是一種個人主義化的現象 ( 雖然個人主義化的含義有待商榷, 詳下文 )。批判階級、階層模式的德國社會學者認為, 雖然社會階級 ( 階層 ) 模式下有多種畫分與測量階級 ( 階層 ) 的方式, 但它們都俱有以下三點共同之處 :

一、社會階級 ( 階層 ) 模式描述的社會不平等是團體 ( 亦即階層或階級 ) 間的不平等。此種模式並且假定, 同一階級 ( 階層 ) 的成員有著共同的社會性質與命運 ( 參閱 Kreckel 1997 : 123 )。<sup>3</sup>

二、它們用垂直式的語意學 ( 上、中、下階級 ( 階層 ) ) 描述社會不平等的結構 ( Hradil 1987b : 121; Kreckel 1985 : 307, 1987 : 93-94 )。

三、社會階級 ( 階層 ) 模式視所得、教育、聲望、權力為主要的社會不平等面向, 在實際的研究上, 此模式又以「職業」作為上述四個面向的主要關涉點 ( Hradil 1987b : 117 ; 參閱 Hradil 1983 : 101 ; Berger/Hradil 1990 : 5-6 )<sup>4</sup>, 並假定被分析的社會是「工作社會」 ( Kreckel

---

<sup>3</sup> 韋伯即說, 「身份 ( 地位 ) 位置」 ( ständische Lage ) 是用來表示「一群人生活命運的典型成份」, 其主要決定因素是正面或負面的「聲望」 ( Ehre ), 而聲望又與某種「共同的性質」有關 ( Weber 1972 : 534 )。

<sup>4</sup> 台灣研究社會階層的學者許嘉猷亦將社會階層的主要層面分為經濟面 ( 不平等面向為所得分配 )、政治面 ( 不平等面向為權力分配 ) 及社會面 ( 不平等面向為職業聲望之高低 ), 見許嘉猷

1985 : 307, 1987 : 94 ) , 亦即一充分就業之社會 ; 換言之 , 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在工作與生產關係 ( Kreckel 1985 : 307 ) 。 因此 , 社會階級 ( 階層 ) 模式的主要分析對象是男性、成年的「正常公民」 ( Kreckel 1982 : 618 ) 。 而無經濟自主性的社會成員 , 或者根據他們的經濟支持者 ( 例如家庭主婦根據其丈夫、未成年人根據其父親或母親 )<sup>5</sup> , 或者 ( 例如退休者 ) 根據他們從前、 ( 例如學生 ) 根據他們未來 ( 可能 ) 的經濟活動 , 來決定其隸屬之階級 ( 階層 ) ( Kreckel 1985 : 307, 1987 : 95 ) 。

( 特別是 ) 上述第三項特性 , 使社會階級 ( 階層 ) 模式無法含蓋所有的社會成員、社會部門和社會次體系 , 因此自 60 年代末 , 學界即越來越傾向以較廣泛的「社會不平等」概念取代之 ( 參閱 Kreckel 1982 : 617 ) 。 社會不平等的真實結構要比社會階級 ( 階層 ) 模式所描述的複雜得多。尤其是新近才形成或才顯得重要的社會不平等新面向<sup>6</sup> , 並非對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候、在每一個生活範圍內都有著相同的重要性 ( Hradil 1987b : 124-125 ) , 這使得研究者在選擇測量社會不平等的指標時 , 更加困難。

70 年代 , 法國學者 Bourdieu 提出以生活風格 ( Lebensstil ) 作為社會不平等的新分析面向 , 影響深遠。然而 , Bourdieu 並未放棄階級概念。 Bourdieu 的「社會空間」 ( Sozialer Raum ) 概念包含兩個層面 ,

---

1986 : 47-103。此外 , 在階級結構的經驗研究上 , 台灣學者亦常根據某項理論 , 以職業或經濟特性作為階級分類的主要標準 , 例如許嘉猷 1989, 1994 ; 蕭新煌 1994。

<sup>5</sup> 家庭因此是傳統的階級或階層模式的具體分析對象 , Schumpeter 很早就曾說過 : 「家庭 , 而非具體的人 , 是階級理論中的真實個體。」 ( Schumpeter 1953 : 158 ) 參閱 Kreckel 1997 : 122-123。

<sup>6</sup> 新的社會不平等包括工作位置穩定性的不平等、基礎結構條件的不平等、生態環境的不平等、獲取公共資源機會的不平等 ; 這些新的不平等多半與職業活動無關 ( Hradil 1987b : 117-118 ; Kreckel 1987 : 95-96 ) 。 當然 , 所謂的新的社會不平等未必完全是新的現象 , 但它們的重要性及受重視的程度在新近增加了 ( Kreckel 1987 : 97-98 ) 。 例如 , 在當今的先進福利社會 , 資本家和無產階級間的衝突已不再重要 , 有工作者和無工作者 ( 失業者、退休者、家庭主婦 ) 間的不平等則越來越值得關注 ( Kreckel 1985 : 308 ) 。 然而這些 ( 新的 ) 社會不平等 , 卻是社會階級 ( 階層 ) 模式很少考慮的。 ( 有關新的社會不平等的較詳細討論見 Hradil 1987a : 29-57 ) 。

其一是「社會位置」( Stellung; Position )，其二是「生活風格空間」( Raum der Lebensstile )。社會位置牽涉的是客觀的生活條件，俱有相同位置的人組成某一階級；生活風格則是行動者在象徵體系中的外顯行為 ( Bourdieu 1985 : 9-46; 1998 : 171-399 )。聯結社會位置 ( 客觀的生活條件 ) 與生活風格的是 Habitus ( 習性 ; 習得的性質 )，亦即，客觀的生活條件塑造出 Habitus，Habitus 又決定了生活風格 ( Bourdieu 1974 : 125-158; 1998 : 277-404 ; 特別是 1998 : 280 之附圖 )。換言之，對 Bourdieu 而言，生活風格可說是階級在象徵體系中的外顯形式，所謂的品味與風格是「階級品味與生活風格」( Bourdieu 1998 : 401 )。

部份研究社會不平等的德國學者 ( 以貝克、彼得·A·柏格 ( Peter A. Berger )、賀拉迪 ( Stefan Hradil ) 及克瑞可為代表 )，則有較激進的想法。他們認為，尤其是在當今最先進的工業社會，很難僅僅根據社會階級 ( 階層 ) 模式來分析社會不平等，因此主張以新的概念和模式取代社會階級 ( 階層 ) 模式。筆者將他們的主張歸納為三個核心概念，即：1. 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2. 水平式的不平等；3. ( 個人可主觀決定的 ) 生活風格。以上第三點 - ( 個人可主觀決定的 ) 生活風格，與個人主義化論題密切相關，亦可將其視為個人主義化的一種現象；第二點 - 水平式的不平等，則與本文題旨無甚相關。故以下僅討論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及生活風格與社會氛圍。

## (二) 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

如同前述，社會階級 ( 階層 ) 模式在分析社會不平等時係以團體 ( 亦即階級或階層 ) 為單位。然而當今的先進工業社會，由於經濟之富裕，及 ( 在各國規模大小不一的 ) 社會福利制度之建立，個人所掌握的資源、社會安全和流動性均有所增加，使個人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少受到客觀社會位置的影響 ( Hradil 1987b : 122; 1987a : 161 )。所得及生活水準、教育程度、社會流動性的提高，消除了作為階級建構前提的貧窮化和異化 ( Entfremdung )，使社會不平等越來越成為個人的

事 ( Beck 1986 : 122-133 ) , 敏銳的觀察者因此要問 : 「 在先進工業社會中 , 階級或階級衝突是否已不存在 ? 」 ( 參閱 Beck 1983, 1986 : 121-160; Giegel 1987 )<sup>7</sup> 但階級的終結並不代表不平等的終結 , 相反地 , 人類社會充斥著越來越多的風險及風險的不平等分配 , 然而風險的不平等分配也個人主義化了 ( Beck 1986 : 158 ) 。

以失業風險為例 , 先進社會中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及隨之產生的新貧窮 , 很難用階級 ( 階層 ) 的概念去分析 ; 失業比較屬於個人的命運 , 而且失業的狀態未必貫穿個人的生涯史 , 極可能只是個人生涯中斷續出現的現象 ( Beck 1986 : 143-151 ) 。 當工作位置的不穩定性增加時 , 每一個職業團體中的個人都有可能失業 , 失業已非某幾個特定社會階層的命運。而且我們很難將所有的失業者歸於一個「失業者」社會階層之下 , 這是因為同樣是失業者 , 卻有非常不同的教育程度和經歷 , 而失業狀態持續之長短 , 更因人而異。當一個社會的失業率高達 10% 至 20% 時 , 失業者的數量不可忽視 , 卻並未形成一俱有共同性質、共同命運的社會團體 , 則失業者及與失業相伴隨之貧窮、社會聲望之降低 , 便無法透過傳統的社會階級 ( 階層 ) 模式來分析。

### ( 三 ) 生活風格與社會氛圍 ( soziale Milieus )

賀拉迪認為 , 不平等不僅與客觀的生活條件有關 , 也與個人的態度、氣質等主觀因素有關。經濟的富裕、資訊的爆炸及社會福利的擴展 , 使個人越來越有能力型塑自己的生活 , 主觀因素與不平等之間也因此有了越來越強的相關性 , 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因此形成 ( Hradil 1987a : 161-162 ) 。 換言之 , 哪些生活條件是重要的、自己過得比別人好或是不如別人 , 越來越屬於個人主觀認知的問題。

鑒於社會不平等越來越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 , 賀拉迪主張 , 在社

---

<sup>7</sup> 克瑞可認為 , 社會階級的概念已不適合用來分析像德國這樣的先進工業社會 , 但抽象的階級關係 ( 即勞資關係 ) 概念則仍有其價值 ( Kreckel 1990 ) 。

會不平等的研究上，應該將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加以區別，雖然這並不否定兩者間可能的相關性( Hradil 1987a : 161-162 )。值得注意的是，主觀因素一方面屬於個人的認知範圍，但外在因素的影響、互動的過程、集體行為，會使某些不同的個人擁有某些相同的態度、氣質或意識類型，這就使得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生活風格」類型，而且這裡所謂的生活風格，並非具體的個人的日常思想與行為，而是經過研究者抽象化的某一社會群體的典型行為方式( Hradil 1987a : 163-164 )。由是，生活風格本身便可作為社會群體的分類標準<sup>8</sup>，而不再是某一階級、階層或社會位置的附屬性質；或者說，某一特定的「生活風格族群」是貫穿分佈於不同的階級、階層或社會位置。當然，在先進福利社會中，同一生活風格族群中的個人，未必有著共同的命運，這又是一種個人主義化的現象。

很明顯地，賀拉迪所謂的生活風格與前文敘及的 Bourdieu 的生活風格概念是不同的。對於 Bourdieu 而言，生活風格與社會階級密切相關，某一社會階級內相同的生活條件導致該階級成員擁有近似的 Habitus，Habitus 又決定了該階級的生活風格。賀拉迪的生活風格概念與外在的社會不平等結構間則不一定有相關性存在；生活風格可以是客觀環境條件的產物，也可以是個人的主觀選擇<sup>9</sup>，因此，生活風格未必與社會位置相關( Hradil 1987a : 164 )。例如，消費風格固然與收入(客觀條件)有關，但也與消費者的主觀品味、欲望有關。

換言之，Bourdieu 雖然提出了生活風格作為社會不平等的新分析面向，但對他而言生活風格是附屬於社會階級的；賀拉迪則賦予生活風格較獨立的地位，生活風格本身，便可作為社會群體的分類標準，此即以下要介紹的「氛圍」( Milieu ) 概念。

---

<sup>8</sup> Karl H. Hörning 及 Matthias Michailow ( 1990 ) 亦認為，生活風格是一種社會形成( Vergesellschaftung )、社會整合的形式。

<sup>9</sup> Hartmut Lüdtke 曾嘗試透過經驗研究，檢驗是客觀環境條件還是個人喜好對生活風格的形成有較大的影響力，然而由於研究方法上的限制，Lüdtke 認為該研究的結果只能使人「猜測」客觀條件的影響不會大過個人喜好( Lüdtke 1990 : 450-451 )。

擁有共同生活風格的人組成某一「氛圍」( Hradil 1987a : 165 ) , 氛圍的界定與其組成者的主觀動機、目標有關, 也與其組成者行動的客觀條件與後果有關 ( Hradil 1987a : 166 ) 。氛圍 ( 或者社會氛圍 ) 又可分為微氛圍 ( Mikromillieus ) 和大氛圍 ( Makromillieus ) 兩種, 前者其成員間有直接的接觸 ( 例如俱有相同生活風格的朋友圈子 ) , 後者則包括 ( 某一社會 ) 所有擁有相似生活格的個人, 儘管他們可能從未有過接觸 ( Hradil 1987a : 167-168 ) 。

在賀拉迪的氛圍模式中, 氛圍的界定指標是生活目標, 換言之, 不同的生活目標對不同的氛圍有不同的重要性 ( 當然, 這些生活目標都是普遍被接受的, 只是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重要性 ) 。其實, 早在 1979 年, Nowak & Sörgel 社會科學中心 ( 簡稱 SINUS ) 即開始研究德國人的生活風格與社會氛圍 ( 用的是非結構性的訪問法 ) ( 參閱 Hradil 1987a : 127 ) 。該公司 1984 年公佈的為德國香煙製造商 Reemtsma 做的一項研究 ( SINUS 1984 ) <sup>10</sup> 中, 建構出西德社會的七種氛圍。賀拉迪將這七種氛圍與生活目標的概念相結合, ( 主觀 ) 界定出各氛圍的主要生活目標及與其相對應的不平等生活條件面向 ( 見表二 ) 。

表二：西德之社會氛圍

氛圍名稱	主要的一般生活目標	主要的不平等生活條件面向
保守、高雅氛圍	成就 權力	正式教育 正式權力
小市民氛圍	成就	正式教育、職業聲望

<sup>10</sup> 此外, 一九八四年, 德國社會民主黨 ( SPD ) 常委會在一項關於社民黨勝選潛力的研究中, 曾採納 SINUS 的社會氛圍模式做分析 ( Vorstand der SPD 1984 ) ; Gluchowski 亦曾研究過德國的政治生活風格群體 ( 1987 ) 和休閒生活風格群體 ( 1988 ) 。

	安定 富裕	風險 金錢
傳統的勞工氛圍	安定 富裕 減輕負擔	風險、社會保險 金錢 工作及休閒條件
進取向上氛圍	成就 富裕	正式教育、職業聲望 金錢
技術官僚—自由氛圍	參與 成就 自我實現	民主制度 正式教育 社會角色
享樂主義氛圍	自我實現 減輕負擔 整合	社會角色 工作與休閒條件 社會關係
另類—左派氛圍	整合 參與 自我實現	社會關係 民主制度 社會角色

Hradil 1987a : 169

由表二可知，不同的社會氛圍有著不同的主要生活目標，而不同的生活目標涉及不同的不平等生活條件面向，則不同社會氛圍的成員，在認知、界定社會不平等時，所採納的指標應該有所不同。

### 三、個人主義化與（新）社會整合 - 貝克夫婦的論點

從前述貝克《風險社會—邁向另一個現代之路》一書，其第二部份的標題「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工業社會生活形式的去傳統

化」(底線為筆者所加),即可知道,貝克的個人主義化論題牽涉的範圍不只是社會不平等的研究,在貝克的眼中,個人主義化實為高度工業化的福利社會的主要特徵,它標示著「大團體社會的終結」(Beck 1986: 139),亦即團體不再是社會與個人間之中介物,個人與社會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直接關聯」(neue Unmittelbarkeit)(Beck 1986: 158)。「個人自身成了社會在生活世界中的再生產單位。」(Beck 1986: 209)面對個人主體性對社會影響的增加,社會學應更多地注意主體,貝克與其妻, Erlangen 大學社會學教授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因此主張建立起「個人社會學」(Soziologie des Individuums)(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30)。

「大團體社會的終結」其實就是傳統社會學所認知(或者說型塑)的現代社會的解構,實際上也就是傳統社會學的解構。然而,貝克不像後現代論者那樣,停留於對於現代的解構的觀察,而是在解構後做起了再建構的工作。這種再建構工作不只是理論上的,似乎也是貝克夫婦的一種使命宣言(詳下文)。

然而關於個人主義化論題的含義及適用性,是頗有爭議的。除了前述《風險社會》一書,貝克夫婦在 1994 年主編的《有風險的自由》(*Riskante Freiheiten*, Frankfurt / M.) 論文集,發表了〈現代社會中的個人主義化 - 主體取向社會學的觀點與論爭〉(Individualisierung in modernen Gesellschaften – Perspektiven und Kontroversen einer subjektorientierten Soziologie), 該文較完整扼要地呈現了兩人對個人主義化的詮釋,但亦暴露出其論題的模糊性。

### (一)「個人主義化」的含義

僅從字面理解,個人主義化論題牽涉的是社會聯繫力、社會團體的瓦解,及以個人為中心的價值觀的盛行,社會整合的問題似乎不屬於此一論題的範疇。前述「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及「生活風格的主觀化」概念,即不涉及社會整合的問題。然而,貝克所謂的個人

主義化，實係一體兩面，其指涉的不只是社會聯繫的中斷，也涉及社會的再整合。貝克甚至用「三重的個人主義化」(dreifache Individualisierung)(Beck 1986: 206)來形容。所謂三重的個人主義化，可理解為個人主義化的三個面向或三階段，這三個面向或三階段分別是：

1. 個人從舊有的社會形式與聯繫中解脫出來(即「解脫面向」(Freisetzungsdimension));
2. 舊有的信仰與規範失去了意義(即「除魔化面向」(Entzauberungsdimension));
3. 個人進入了新的社會聯繫中(控制或再整合面向(Kontroll- bzw. Reintegrationsdimension))(Beck 1986: 206)。

詮釋和批判貝克個人主義化論點的佛列德利斯，則將個人主義化區分為以下三階段：高程度的制度化；逐漸增強的解制度化及個人選擇(Option)可能性的增多；再制度化(Friedrichs 1998: 35)。若對後兩個階段做更細緻的描述，則可區分為以下三個過程：1. 對傳統機制依賴程度的減低；2. 選擇多樣化，個人可規劃自己的生涯史；3. 新的制度化依賴，最重要的是勞動市場(Friedrichs 1998: 37)。(以上 1.與 2.，係佛列德利斯根據 Beck 1986: 116-117 及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14-15；3. 係根據 Beck 1986: 119 及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14。)

貝克所謂三重的個人主義化，其頭兩個面向 - 解脫面向與除魔化面向，均屬於舊社會秩序瓦解的過程，所以，較簡化地說，個人主義化包含有「(舊)社會(秩序)解體」與「社會再整合」兩個面向。前述貝克夫婦 1994 年的論文中，亦視個人主義化為包含雙重含義的概念，而其第一層含義是：「既定的社會生活形式的瓦解」(例如「階級和地位、性別角色、家庭、鄰里關係等」)；與此伴隨的問題是：「何種新的生活形式會出現」？由此便導出個人主義化的第二層意義：「在

現代社會中，個人面臨新的制度要求、控制與強制。」(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11-12 ) 這些現代的、非傳統的規則，透過勞動市場、福利國家、官僚體系運作，可謂嚴密繁複，然而貝克夫婦並不認為這些規則 ( Vorgaben ) 僅僅是對個人的束縛，反而認為其存在的目的在於使個人能「過自己的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這些規則必須由個人自行建立起來，因為，現代的制度主要不是行為的限制，而是供給與行為的鼓勵 ( 例如社會福利 )，個人必須努力以赴才能在競爭中獲得供給與獎勵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12 )。現代的規則不僅使個人有更多的機會過自己的生活，還阻礙了家庭的共同生活與凝聚力，其原因主要來自於現代的福利制度，因為大部份的社會福利不是根據家庭，而是根據個人的需要制定。福利國家因此強化了個人主義化的生活方式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14 ; 參閱 Leisering 1998 )。

貝克夫婦又認為，個人主義化不是個人自由的決定，而是個人被強迫自己型塑、導演自己的生涯史和社會網絡，而在此一自我型塑的過程中，又伴隨著個人喜好和生命階段的轉變，而且個人必須配合其他的個人以及勞動市場、福利國家等的規則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14 )。在個人主義化的風潮下，個人必須決定自己的生活風格 ( Lebensführung )，而且這種決定被視為非常重要 ( 被神化了 )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19 )。隨著個人決定必要性的增強，不需個人多加思考的例行社會行為便減少，造成一種日常生活的「解例行化」 ( Entroutinisierung ) 現象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17-20 )。而當選擇可能性和決定的必要性增加，個人的行動需要也隨之增加，個人必須更能適應、更能整合，需要更大的彈性與承受壓力的能力。許多的機會、危險、不確定性，不再是在家庭、社群、社會地位或階級的脈絡中被定義，而是個人自己必須對其知覺、解釋、決定和處理。個人的機會和負擔因此同步增加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14-15 )。從前那種進展有序的「標準生涯史」 ( Normalbiographie )，轉變成「選擇生涯史」 ( Wahlbiographie )、「自己動手做生涯史」

( Bastelbiographie )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13 )。而且，隨著決定必要性的增加，風險也隨之提高，個人主義化因此成為一種「有風險的自由」(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32 )，個人生涯史成了「風險生涯史」( Risikobiographie )、「鋼索生涯史」( Drahtseilbiographie )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13 )。

## (二) 新社會整合

前面說過，所謂的個人主義化論題包含了「社會解體」與「社會再整合」兩個面向，而貝克認為，第二個面向是當代一個困難的課題。要言之，貝克試圖尋求「個人主義式的社會整合」的建立可能性；不僅如此，在學術的視野上，貝克夫婦並且主張建立所謂的「主體取向的」( subjektorientierte ) 社會學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27 )。

貝克夫婦認為，社會學向來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視野，其一係從個人的角度觀察社會，其二則從整體（社會、國家、階級、家庭等）的角度觀察社會。貝克夫婦並且認為，從個人的角度分析社會者，不會把社會的形式視為既成不變的，反而會對社會制度持懷疑的態度。而從整體的角度觀察社會者，則強調社會滿足個人需要的功能，只有在社會中，個人才可能是個人，而個人要從社會中獲得本身需要的滿足，必須盡義務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26 )。從整體的角度觀察社會，是社會學的主流視野，從個人角度出發的視野則長久受到壓迫，並被認為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觀點。然而在大政治陣營及政黨政治共識形式終結以後，我們有必要去問甚麼樣的共同性會形成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26-27 )。

涂爾幹和齊默爾 ( Georg Simmel ) 還能想像在個人主義化的社會中存在著一種超越的價值整合，然而當個人越來越脫離傳統的團體和整合形式，這種觀點就似乎越來越不實際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28 )。這是因為個人主義化是自治、解放與脫序的混合，充滿了矛盾 ( Beck / Beck-Gernsheim 1994 : 19 & 32 )，因此我們有必要問，

在個人主義化的效應下我們該如何分析社會？高度工業化的社會有可能整合嗎（Beck / Beck-Gernsheim 1994：33）？

在此一問題上，貝克夫婦認為，高度工業化社會原有三種整合形式，但是都已失效，這三種整合形式是：

1. 超越的共識、價值整合；
2. 共同的物質利益及制度依賴（對勞動市場、福利國家的依賴）；
3. 民族、國家意識（Beck / Beck-Gernsheim 1994：34-35）。

貝克夫婦認為，三種整合形式的失效，引起了許多問題，但走回頭路的結果更糟糕。例如在德國及其他西歐國家，有些人回歸到傳統的民族、種族意識，結果引發仇視外國人的嚴重衝突（Beck / Beck-Gernsheim 1994：33）。按，在人口全球流動頻繁的當代，高度工業社會的種族成份日益複雜，傳統民族、種族意識的復興，只會引起更多的衝突。所以，當代社會應該尋求新的社會整合形式。問題是，新的社會整合形式，其內在邏輯與從前是否有根本的區別？

貝克夫婦似乎認為，新的社會整合有著與傳統截然不同的邏輯。兩人援引已故德國社會學界元老、前科隆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主任 René König 的說法 - 整合已經無法在制度層面，而只能在思想層面形成（Beck / Beck-Gernsheim 1994：36；König 1979：pp. 367），提出所謂的「計劃整合」（projektive Integration）（Beck / Beck-Gernsheim 1994：35），並做出如下的詮釋：

「後傳統社會只能在其自我解釋、自我觀察、自我開放、自我發現、自我創造的實驗中成為可整合的。非傳統社會的未來、未來能力、未來形式是其整合的標準。」（Beck / Beck-Gernsheim 1994：36）

這是說，新社會整合必須在高度的自我反省下建立起來，而且必須有很強的未來取向，亦即可以不斷自我修正。

至於究竟有哪些現代（第一現代）的社會整合機制瀕臨崩解？我們舉出重要者如下：

階級（階層）社會的終結（對此本文已著墨不少）；

工作社會的終結（指受雇工作位置的減少，見 Beck 1986:220-248; Berger 1996:55-58）；

傳統婚姻與家庭制度的（進一步）解體（Beck 1986:161-204; Beck/Beck-Gernsheim 1990）；

宗教信仰與教會組織的（進一步）沒落（Pollack / Pickel 1999）；

民族國家及國家政治的式微（Beck 1999a）

而針對第一現代的解構，貝克等學者提出的第二現代解決方案舉例如下：

公民工作（由公家給予社會公益工作者酬勞，此亦可降低失業人口數，見 Beck 2000）

家庭民主化（Beck 1998）；家事的兩性分工（Kaufmann 1998）；各種形態的「計劃式兩性關係」（Beck-Gernsheim 1998）；

以「公民社會」補充國家政治與政黨式民主（Beck 1993:219-227; Giddens 1999:79-110）；

以「跨國國家」（Transnationalstaaten；複數）模式補充民族國家的架構（Beck 1999a:144-145）

#### 四、「理性選擇理論」vs.個人主義化論點

1998年，第一本批評貝克個人主義化論點的論文集問世，主編係科隆大學（Uni. zu Köln）社會學教授佛列德利斯（Jürgen Friedrichs），書題為《個人主義化論題》（*Die Individualisierungsthese*. Opladen），共收錄十三篇論文。該論文集一方面嘗試詮釋個人主義化

論題（並指出此一論題的模糊之處），一方面則對此一論題從理論和經驗研究的角度提出了許多批評。十三篇論文中有四篇是理論性的，其中除了布來梅大學私人講師 Lutz Leisering( 1998 )認為社會福利制度確實有導致個人主義化的效應外，其餘三篇則對貝克的個人主義化論題提出了較多的質疑。其中，佛列德利斯毫不保留地批評貝克的個人主義化論題既未被充分地解釋，也未經充分的經驗研究檢驗；事實上，個人主義化論題只有部份是可以解釋的，原因則是其定義的含糊不清（Friedrichs 1998：33-34）。

1999 年，佛列德利斯及其同事雅格欽斯基( Wolfgang Jagodzinski )又共同主編了《社會整合》( *Soziale Integration*. Opladen ) 一書，此書係針對貝克論題中「社會整合如何可能？」而來。兩本論文集對釐清及反思個人主義化論點有很大的助益。

在個人主義化的定義上，前面已經說過，貝克所謂的個人主義化包含「社會解體」與「社會再整合」兩個面向。然而還有另一個問題：所謂個人主義化指涉的究竟是社會結構的客觀現象？抑或個人主觀的價值觀？如果兩者皆是，其間的關係如何？

對此，貝克曾表示，個人主義化不僅有上述所謂的三重意義（亦可視為個人主義化的三階段），個人主義化還同時牽涉以下兩個面向：1. 客觀的「生活位置」( Lebeslage ) 及 2. 主觀的意識 / 認同。但是貝克認為，主觀層面的相關研究很少，而其本身的研究亦集中於客觀層面（Beck 1986：206-207）。

然而即使我們將個人主義化的研究集中於客觀層面，亦可( 亦應 ) 區分出微觀、中介和鉅觀三個層次。貝克的探討當然包括這三個層面，但他並未針對這三個層面做出清楚的概念區分。詮釋和批判貝克的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 ( Markus Klein )，則主張必須從微觀、中介和鉅觀三個層次去捕捉個人主義化的表現形式，個人主義化在三個層次的表現為：

「在微觀層次，個人在選擇指導其行為的價值和目標時的自主性

提高；

在中介 ( Meso- ) 層次，社會制度與團體的結合與型塑力量降低；在鉅觀層次，則在所有的生活範圍都出現社會多元化增強的現象。」( Jagodzinski / Klein 1998 : 13 )

個人主義化有以上三個層次的外顯形式，但這些現象的存在，其原因卻未必是個人主義化。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認為，所謂的個人主義化論點指涉的現象主要是「異質性」和「多元化」的增加。然而如果異質性和多元化增加的現象是一種個人主義化的過程，其原因必須出於微觀層次的「個人主義」。反之，如果這些現象僅從機會結構 ( Opportunitätsstruktur ) 的變遷 ( 客觀環境的轉變使個人的選擇機會增加 - 筆者 ) 就能解釋，便不能視其為個人主義化的現象( Jagodzinski / Klein 1998 : 23 & 28-29 )。換言之，所謂個人主義化要名副其實，必須人的性質發生轉變，亦即個人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增強；如果改變的是行為環境及機會結構，不是人的性質，則異質性和多元化增強的現象，便不能稱其為個人主義化 ( Jagodzinski / Klein 1998 : 29 )。

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並且將微觀層次的個人主義區分為客觀的個人主義 ( 可直接觀察的個人主義 ) 和主觀的個人主義。客觀的個人主義是從可觀察到的個人性質和行為去定義，而不牽涉個人內在的價值觀和心理 ( Jagodzinski / Klein 1998 : 16 )。主觀的個人主義則是根據個人內在的需要、態度、信念、價值或個人認知結構的性質去定義 ( Jagodzinski / Klein 1998 : 19 )。據此，所謂的個人主義化現象，亦即異質性和多元化的增強，必須或者跟客觀的個人主義，或者跟主觀的個人主義有關，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化。如果這些現象只是因為外在機會結構的變遷而產生，便無所謂甚麼個人主義化。

佛列德利斯、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均認為機會結構的轉變便足以解釋異質性和多元化增強的現象。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並舉 Rainer Schnell 及 Ulrich Kohler 所做的一項經驗研究說明。Schnell 及 Kohler 研究的是 1953 - 1992 年間德國選民的政黨傾向，此一著名的經驗研

究，似乎可支持貝克的個人主義化論點，因為研究顯示，社會人口變項（例如宗教信仰、年齡、性別、職業、教育程度）與個人的投票意向（支持哪一個政黨）間的相關性，隨年代的演進降低（Schnell / Kohler 1995：636）。然而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認為，這種現象可以用機會結構的改變來解釋，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和基督教民主聯盟 / 基督教社會聯盟（CDU / CSU）均朝向全民政黨發展，不再只是某一特殊社會利益的代言人，因此也不再具有某社會階層、社會團體成員專投票給某政黨的現象；又如，德國天主教徒不再是弱勢團體，因此不再需要專屬的利益代表，天主教徒的投票意向便發生了異質化的現象<sup>11</sup>（Jagodzinski / Klein 1998：25）。

此外，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還認為，個人主義化的價值並不一定會導致更多的異質化。首先，從邏輯而言，當個人主義化的價值越來越普及，那麼，在這一點上，個人間的同質性就越高。而且，個人主義化的價值的普及，也會導致行為模式的同質化。例如，如果所有的婦女都追求自立，而且認為經濟的獨立對自立是不可或缺的條件，那麼，在生涯規劃上，所有的婦女都會先追求夠格的教育程度，然後追求職業工作（Jagodzinski / Klein 1998：27）。

總之，雅格欽斯基、佛列德利斯等學者，雖承認當代社會有異質性、多元化增強的現象，但認為其原因是機會結構的改變，而非人的性質改變；而只要其原因並非人的性質的改變（即人變得較個人主義），就不必以個人主義化來形容這些現象。

佛列德利斯又認為，所謂的個人主義化論題，從鉅觀層次而言，涉及社會變遷理論，從微觀層次（即個人的行為層次）而言，則涉及行動理論。欲解釋看似與個人主義化有關之個人行為，適用的行動理論是「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RCT）（Friedrichs 1998：46）。這些看似與個人主義化有關之微觀層次上的現象，包括

---

<sup>11</sup> 1871年德國的統一是由普魯士完成的，普魯士是新教國家，且德國的天主教區域工業化起步較晚，因此很長一段時間，天主教徒在德國處於較弱勢的地位，在政治上則多支持基民 / 基社盟。

個人決定必要性的增加（個人必須做更多的決定）此帶給個人的風險與負擔、及個人對此之反應，從理性選擇理論看來，這些個人行為均是個人在機會結構中的理性選擇，而未必與甚麼個人主義價值觀有關。關於個人對決定必要性增加的反應，佛列德利斯（Friedrichs 1998：42）與貝克（Beck 1986：119-212）均認為，個人選擇可能性的增加，導致個人決定的負擔過重，個人因此尋求可以減輕決定負擔的機制。佛列德利斯並且認為，個人主義化論點真正的核心在於：「個人必須自己承擔個人主義化的代價」（Friedrichs 1998：42）。佛列德利斯及雅格欽斯基均認為，當個人的行動空間增加，個人所要承擔的決定責任也隨之增加（Friedrichs / Jagodzinski 1999：28）。個人要做的決定增加，因此不僅自由增加了，負擔或決定的責任也增加了（Friedrichs / Jagodzinski 1999：28）。個人主義化的代價因此是：選擇的可能性增加了，但每一個決定的風險也增加了（Friedrichs 1998：42）。然而佛烈德利斯批評貝克未深入討論此一問題，而直接跳到再制度化（社會再整合）的問題（Friedrichs 1998：42）。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佛列德利斯認為個人至少有三種減輕決定負擔的選擇（Friedrichs 1998：40-41）：

1. 選擇收回時代價不高的決定，例如不結婚，而是同居且不生小孩<sup>12</sup>；
2. 將有益的選擇的可能負面後果外部化，例如委由國家機構或制度化的保障承擔；
3. 讓別人做決定。

支持理性選擇理論的佛列德利斯及雅格欽斯基，亦認為當代社會存在著整合問題，亦即：當社會越來越殊化，不同的團體是否還有可

---

<sup>12</sup> 這是說，收回結婚的決定（即選擇離婚），代價較高；收回同居的決定（不牽涉法律問題的分手），代價則較低。

能達成規範建立的共識（Friedrichs / Jagodzinski 1999：10）？當限制減少、個人選擇的可能性增加，個人層次上的道德行為如何可能（Friedrichs / Jagodzinski 1999：29）？又如前面已經說過的，個人為了減輕決定的負擔，選擇之一是將成本外部化予國家，然而這只能形成形式上的整合，卻無法在個人之間建立起聯繫（Friedrichs / Jagodzinski 1999：28）。但是，佛列德利斯及雅格欽斯基並不認為新社會整合形式有甚麼與從前大不相同的內在邏輯，因為，根據理性選擇理論，為了個人的利益，理性的個人會彼此合作，規範因此而產生（Friedrichs / Jagodzinski 1999：31）。這是社會整合基本的、一貫的邏輯。

## 五、批評與討論

### （一）社會階級的終結與個人主義化的社會分類

個人主義化論點是從否定社會階級模式的理論嘗試中發展出來的。主張社會階級模式不適用的德國學者，多認為社會階級終結的原因是普遍的富裕及社會福利制度的持續實施，換言之，對於不存在這兩項客觀前提的社會，階級模式可能依然適用。然而筆者認為，階級模式是否適用，亦與文化有關，例如傳統的中國社會，水平式的關係網絡可能比垂直式的階級結構來得重要。唯本文限於篇幅無法詳述這些問題。

筆者於此主要想探討的是，如何從社會階級的終結來重新思考社會分類的標準。傳統社會學眼中的個人永遠是社會中的個人，個人被置於某一社會類別之下，社會學關心的不是個人本身，而是個人的社會屬性。傳統社會學又假定，少數幾項社會屬性是基本的，是社會分類的主要指標。這些基本的社會屬性就是所謂的社會人口變項，包括職業、所得、教育程度、性別、年齡等，而前三項又是階級劃分的主

要指標。傳統社會學並且希望所有的個人都能納入基本的社會分類架構之下，而社會階級便是傳統社會學中最重要的基本社會分類架構。這少數幾項基本社會屬性以外的變項，不但被認為是次要的，還常被視為基本社會屬性的依變項。

而推翻社會階級模式的嘗試，不但否定了同一階級的個人間存在著俱關鍵重要性的共同命運（因為階級內的異質性已大過了同質性），並且使我們得以重新思考社會分類的標準。在這一點上，賀拉迪使風格本身得以成為社會分類的標準，最俱啟發性。然而，賀拉迪的西德社會氛圍模式，仍有階級模式的影子，其理由一：雖然進取向上、享樂主義及另類 - 左派氛圍似為階級模式所不曾考慮，然而保守、小市民、勞工及技術官僚氛圍，則為階級模式中已有之社會分類概念；其理由二：雖然同一社會氛圍中的個人無所謂俱關鍵重要性的共同命運，但此一社會氛圍模式似仍欲成為含蓋所有社會成員的社會分類架構。

台灣社會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生活風格族」概念，則比俱普遍含蓋性的社會氛圍模式，更為個人主義化。台灣媒體上常出現如「股票族」、「手機族」、「哈日族」（喜歡日本時尚的人）、「網路族」、「香奈兒族」（穿法國 Channel 牌服裝的人）、「通車族」（必須搭車上學、上班的人）等等的名詞，宏碁電腦公司推銷手提電腦的廣告，為了強調手提電腦的可攜帶性，甚至創造出「行動族」此一名詞。「族」是一個社會群體的概念，而在上述的分類方式中，商品、文化喜好、行為方式等均可成為社會分類的標準，筆者稱此種社會類別為「生活風格族」。生活風格族的概念不企圖提出俱普遍含蓋性的社會分類架構，卻能使社會分類的指標無限制的增加；客觀而言，個人可能屬於許多生活風格族，但只有個人意識到某一指標對他是重要的，他才會認為自己屬於某生活風格族。基於這些原因，筆者稱生活風格族概念是個人主義化的社會分類。不過，這並不是說個人可以完全主觀決定自己的生活風格，風格的選擇一定會受到客觀條件的影響。個人主義化的社會分類與傳統社會學的社會分類的主要差異在於，前者不再

假定少數幾項社會分類的標準是基本的、俱關鍵重要性的，只要某種風格為許多個人所擁有，這種風格就有理由成為俱重要性的社會分類標準；只要個人認為某種風格對其日常生活乃至生涯史的类型塑俱重大意義，他便可以此為標準將自己界定為某一類別的人。

各種「生活風格族」詞彙頻繁出現於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其他社會可能也有類似現象），顯示個人主義化的社會分類已日益重要。然而，商品設計者、時尚專家、廣告業者能提供關於「風格」的訊息，「生活風格族」卻乏人研究。我們很容易獲得咖啡、咖啡廳的訊息，卻少有人研究「咖啡族」（喜歡喝咖啡、泡咖啡廳的人）。究其原因，即是因為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傳統社會學，只假定少數幾種社會分類、社會指標是重要的，如果要研究咖啡族，恐怕也只是做諸如「收入與對咖啡的喜好度」的相關性研究。然而個人主義化的社會分類概念並不認為一定要將某種生活風格歸因於少數幾項社會指標，因此，對於生活風格族的研究，主要不在於量化的相關性分析，而應是質化的描述性研究，並「理解」其背後的意義及值得進一步分析的問題。

個人主義化的社會分類與社會階級模式的終結可說是一體兩面。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社會階級模式的終結指的是社會階級不再是根本的、俱關鍵重要性的社會分類架構，且同一階級成員間的異質性大過同質性。然而，社會階級仍可保留為一種社會分類的方式，我們還是會用到「上層階級」、「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等詞彙，但其意義是有限的，牽涉的主要是所得、職業差異，而非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社會階級的意義、重要性對每個個人亦有所不同。如此，社會階級也成了一種個人主義化的社會分類方式。

## （二）「個人主義化」是否使社會整合需要一種新的邏輯？

前文在詮釋貝克夫婦的個人主義化論點後，又引述了佛列德利斯、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對貝克夫婦的批評。筆者認為，爭論背後的焦點在於：貝克夫婦所謂的個人主義化是否是一種新社會現象，以及

這種新現象是否使社會整合需要新的邏輯？

首先我們要談一下有關個人主義化含義的爭論。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花了很多功夫去界定個人主義化的含義，主張一定要有個人層次上主觀或客觀的個人主義產生，才有個人主義化的事實，並認為個人決定必要性的增加、社會多元化及異質性的增強，其原因在於機會結構的變遷（即個人選擇可能性的增加），與個人主義無關，因此貝克夫婦的個人主義化論點是有問題的。

筆者認為，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的批評有些吹毛求疵。貝克早已言明，個人主義化是「被強迫的個人主義化」，且他觀察的主要是客觀層面的個人主義化現象，與甚麼個人主義不必有相關性。佛列德利斯、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承認當代先進社會確有個人決定必要性的增加、社會多元化及異質性增強的事實，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同意了貝克的論點。

不過，貝克夫婦在詞彙的使用及表達方式上，確常有模糊之處。例如，在談到所謂的「主體取向的」社會學時，貝克夫婦說，從個人的角度分析社會者，會對社會制度產生懷疑。然而，從個人的角度分析，不也可能覺得個人需要社會制度？又，如果說，「主體取向的社會學」或「個人社會學」，其特色在強調個人主導社會過程的力量，則此種力量究竟強到何種程度？前面已經說過，貝克夫婦認為，個人主義化並非個人主動的選擇，而是個人被迫自己型塑自己的生涯史，而且，在這種所謂自我型塑的過程中，個人又必須配合其他的個人及社會規則，則個人的主導能力不是很有限的嗎？<sup>13</sup>。

另一位詮釋和批判貝克的 Matthias Junge 因此認為，貝克的個人主義化論點欲使個人主體成為社會過程的決定者，Junge 稱此為「社會形成的主體化」（Junge 1998：51）。然而，貝克發現個人主義化並未導致社會的解體，結果，個人社會學無法被建立起來，社會學無法

---

<sup>13</sup> Hölscher 在一項有關廣告與生活風格的研究中，雖肯定生活位置的多元化（角色不一致（Statusinkonsistenz））及生活風格的個人主義化的現象，但主要強調的是廣告對生活風格型塑的影響（Hölscher 1998）。此一研究顯示，在生活風格的型塑上，個人的主導權可能不大。

被主體化，而貝克選擇脫離此一困境的方式，Junge 稱之為「社會學的道德化」( Junge 1998 : 58-60 )。如同前述，貝克認為，從傳統的社會聯繫解放出來的個人需要再整合，而貝克不僅是客觀地觀察此一再整合的需要，同時鼓吹建立起（有別於前現代社群的）新社群，以解決當代社會的一些問題。這樣的構想充滿了價值色彩，這便是 Junge 認為貝克將社會學道德化的原因。也因此，Junge 認為貝克的個人主義化論點與「社群主義的社會理論」有相似之處( Junge 1998 : 53-57 )。

現在我們先不論個人主義化是否是表達其所欲之含義的適當詞彙，且前面已說過，佛列德利斯、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與貝克夫婦一樣，均承認個人決定必要性的增加、社會多元化及異質性增強的事實。然而，三位批評者以機會結構的變遷和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這些現象，代表批評者與貝克夫婦的主要區別在於：批評者不認為當代先進社會形成了或需要一種新的社會行動邏輯。

個人主義化是否是一種新現象？又是否因此產生出新的行動邏輯？確實是有疑義的。首先，所謂的個人主義化現象，其時間定位是在哪一個時代？貝克曾明確表示，個人主義化絕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新生事物，中古時代、文藝復興時期、早期的喀爾文教派、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都有當時代的個人主義化生活風格。前述三重的個人主義化，亦被貝克視為一普遍的模式 ( Beck 1986 : 206 )。<sup>14</sup>亦即，前述個人主義化的三階段，實為社會變遷的普遍過程。那麼，當代究竟存在著何種個人主義化的新問題？社會整合又究竟有甚麼樣的新困難？

如果從基本的行動邏輯來看，筆者較同意佛列德利斯、雅格欽斯基及克萊恩的論點，即理性選擇理論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視為社會行為的基本邏輯，個人主義化現象亦可用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問題在於，甚麼是理性的？

---

<sup>14</sup> 馬克思、恩格思、Tönnies、Simmel、涂爾幹、韋伯及 Elias 七位社會學家，及社會學誕生前西方哲學中的各種個人主義化理論，參閱 Kippele 1998。

這個問題我們放到下一節再談。這裡則要談一下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貝克個人主義化論點所要求的新社會整合形式，似乎是一種「個人主義式的社會整合」，這是否使其與第一現代的社會整合有所區別呢？其實不然，因為個人主義式的社會整合原即為西方啟盟時代以來的基本主張。按，啟盟思想家即認為個人先於社會，霍布斯（Hobbes）便主張，個人授權予國家（或它種集體），是為了保護個人的權益免於他人的侵害（參閱 Zippelius 1990：97-127）。不過，從具體的社會機制而言，則確有必有研究當代社會是否面臨著舊整合機制瓦解，新整合機制又該如何建立的問題。<sup>15</sup>

### （三）第二現代是否是一種新的理性主義？

我們雖然同意「理性選擇理論」可以被視為社會行動及社會整合的基本邏輯，這也符合我們在前言中所說的，第二現代與第一現代都注重人的理性。然而問題是：甚麼是理性？如果說，理性的行為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追求最大的利益，並盡量避免損失」，這只是一種「形式化」的敘述而已，因為理性必須顯示於具體的觀念、行為或制度，過於簡化的理性公式不足以解釋具體的行為和制度。這一點，制度經濟學派早已有所批評。

不過，除了這種「形式主義」與「實質主義」間的爭論外，我們還可區分出兩種對理性的不同觀念。大盛於啟盟時代的理性主義，即第一現代的理性主義，雖然俱有反宗教的性格，卻一樣追求絕對真理。而且第一現代的理性過度信賴人類的智慧，認為人的智慧不但可以發現真理，而且可以控制自然與社會，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最能代表這種思想。所以第一現代的理性是絕對主義式的「控制理性」，但往往其所欲為善，結果卻是災難，也就是理性「反身」

---

<sup>15</sup> 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近著 *The Great Disruption*（中譯《跨越斷層》）關心的亦是此一問題（Fukuyama 2000）。

成為非理性，法國大革命、極左、極右的獨裁統治、對生態的嚴重破壞，都是西方第一現代的控制理性所帶來的災難（孫治本 2000b：5-6）。

然而自從約拿斯（Hans Jonas）指出當代科技社會「預知的知識」落後於「技術的知識」，「預知的力量」落後於「行動的力量」的現象（Jonas 1984：28），西方社會開始面對「不確定性作為一種常態」的事實，同時承認人類智慧的有限性。此種思想對中國人則不陌生，「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寓言，早已表達出「禍福相倚」的概念，並顯示「積累的後果的不可預測性」。莊子甚至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矣。」既然人類智慧是有限的，追求知識的結果只是枉然（孫治本 2000b：6）。

唯約拿斯並未激進到要求人類全面放棄知識、放棄技術，而是要求人類評估：是否做某事會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只要有這種可能，就不要做（Jonas 1984：70-76）。所以，約拿斯並未放棄理性、放棄評估的能力，但要求人類放棄可能導致毀滅性災難的行動。筆者稱約拿斯處理不確定性問題的策略為「消極策略」，貝克則進一步提出處理不確定性問題的「積極策略」（孫治本 2000b：6）。在《解藥》（*Gegengifte*）一書中，貝克提出在風險社會中增加安全性的策略：提高對於可能的損害的敏感度；打破科技專家對於安全定義的壟斷，並提高安全標準；重新分配舉證責任，使決策者透明化，而且損害發生時要有人負責（主要根據 Nassehi 1997: 53 的整理；貝克原文見 Beck 1988: 278f）。

所以，第二現代承認人類智慧的有限性，但並不放棄理性，唯第二現代的理性拒絕絕對主義。這倒近似儒家的理性主義 - 一種中庸之道。第二現代的理性首先承認：「原則上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沒有一事是可以預見及控制的。」（貝克語）（Beck 1999b：79）這是處理風險必須有的基本認知。就本文探討的第二現代面向之一 - 個人主義化及新社會整合而言，個人主義化意味個人做決定的必要性增加，則個人必須承擔的風險也增加。所以處理個人主義化的問題，部份即是

處理不確定性的問題。

而新社會整合的基本理念，亦必須拒絕第一現代的控制理性，而尋求在不確定性中建立起秩序，然而這種秩序永遠沒有「最佳方案」，甚至秩序本身亦有其不確定性，第二現代理性的任務因此是不斷地反省，讓理性既適應也創造，前述貝克夫婦倡議的「計劃式整合」，即有此意。而且第二現代的理性主義除了必須承認不確定性外，還要能容忍錯誤，因為「完美」是不可能的，「完美主義」導致的經常是發展的停滯。「容錯」的精神則有助於人發現錯誤，開啟不斷發展的可能性。

筆者的結論因此是：第二現代的觀念確實能發展出一種新理性主義。這種新理性主義揚棄西方第一現代絕對主義式的控制理性，筆者建議稱此第二現代的理性為「學習型理性」(孫治本 2000b: 6)。筆者又認為，儒家文化更能理解此種學習型理性。當然，最後這一個論點，可能會引起很大的爭議，而本文亦無法繼續一探其究，乃收筆等待未來討論的機會。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部份

孫治本，2000a，〈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思與言》(38-1): pp. 147-184。

孫治本，2000b，〈學習型理性：與貝克談第二現代〉，《當代》一五六期：pp. 4-13。

許嘉猷，1986，《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台北：三民。

許嘉猷，1989，〈台灣中產階級的估計及其社會經濟特性〉，收在蕭新煌(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pp.57。

許嘉猷，1994，〈階級結構的分類、定位與估計：台灣與美國實證

- 研究之比較》，收在同作者（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台北：中研院歐美所，pp.21。
- 黃瑞祺，2000，《現代與後現代》，台北：巨流。
- 蕭新煌，1994，〈新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台灣、美國與瑞典的初步比較〉，收在許嘉猷（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台北：中研院歐美所，pp.73。
- Beck, Ulrich. 1999a. 《全球化危機》（孫治本譯）。台北：商務。
- Best, Steven / Kellner, Douglas. 1994. 《後現代理論 - 批判的質疑》。台北：巨流。
- Baudrillard, J. 1983.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 Semiotext (e).
- Fukuyama, Francis. 2000. 《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張美惠譯）。台北：時報文化。
- Giddens, Anthony. 1999. 《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鄭武國譯）。台北：聯經。
- Smart, Barry. 1997. 《後現代性》（李衣雲 / 林文凱 / 郭玉群譯）。台北：巨流。

## 二、德、英文部份

- Beck, Ulrich. 1983. *Jenseits von Klasse und Stand? - Soziale Ungleichheit, gesellschaftliche Individualisierungsprozesse und die Entstehung neuer sozialer Formationen und Identitäten*, in : Reinhard Kreckel ( Hg. ) : *Soziale Ungleichheiten*. Göttingen, pp. 35-74.
- Beck, Ulrich.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M.
- Beck, Ulrich. 1988. *Gegengifte. Die 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 Frankfurt/M.
- Beck, Ulrich. 1991. *Der Konflikt der zwei Modernen*, in: demselben: *Politik in der Risikogesellschaft*. Frankfurt/M., pp. 180-195.

- Beck, Ulrich. 1993.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Frankfurt/M.
- Beck, Ulrich. 1997. *Was ist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 Beck, Ulrich. 1998. Demokratisierung der Familie, in : demselben : *Kinder der Freiheit*. Frankfurt/M., pp. 195-216.
- Beck, Ulrich. 1999. Modell Bürgerarbeit, in Ulrich Beck (Hg.) : *Schöne neue Arbeitswelt. Vision : Weltbürgergesellschaft (2. Auflage)*. Frankfurt/M., pp. 7-189.
- Beck, Ulrich. 2000. Die Seele der Demokratie : Bezahlte Bürgerarbeit, in demselben (Hg.) : *Die Zukunft von Arbeit und Demokratie*. Frankfurt / M., pp. 416-447.
- Beck, Ulrich/Beck-Gernsheim, Elisabeth. 1990. *Das ganz normale Chaos der Liebe*. Frankfurt/M.
- Beck, Ulrich/Beck-Gernsheim, Elisabeth. 1994. Individualisierung in modernen Gesellschaften - Perspektiven und Kontroversen einer subjektorientierten Soziologie, in : denselben ( Hg. ) : *Riskante Freiheiten - Individualisierung in modernen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Main., pp. 10-39.
- Beck-Gernsheim, Elisabeth. 1998. *Was kommt nach der Familie? - Einblicke in neue Lebensformen*. München.
- Berger, Peter A. 1996. *Individualisierung : Statusunsicherheit und Erfahrungsvielfalt*. Opladen.
- Berger, Peter A./Hradil, Stefan. 1990. Die Modernisierung sozialer Ungleichheit - und die neuen Konturen ihrer Erforschung, in : Peter A. Berger & Stefan Hradil ( Hg. ) , *Lebenslagen, Lebensläufe, Lebensstile, Soziale Welt, Sonderband 7*. Göttingen, pp. 3-24.
- Bourdieu, Pierre. 1974. *Zur Soziolog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Frankfurt/M.
- Bourdieu, Pierre. 1985. *Sozialer Raum und "Klassen"*. Frankfurt/M.
- Bourdieu, Pierre. 1998. *Die feinen Unterschiede - Kritik der*

- gesellschaftlichen Urteilskraft* ( 10. Auflage ) . Frankfurt/M.
- Friedrichs, Jürgen. 1998. Die Individualisierungs-These - Eine Explikation im Rahmen der Rational-Choice Theorie, in : Jürgen Friedrichs ( Hg. ) : *Die Individualisierungs- These*. Opladen, pp. 33-47.
- Friedrichs, Jürgen / Jagodzinski, Wolfgang. 1999. Theorien sozialer Integration, in : denselben ( Hg. ) : *Soziale Integration*. Opladen, pp. 9-43.
- Giegel, Hans-Joachim. 1987. Individualisierung, Selbstrestriktion und soziale Ungleichheit, in Bernhard Giesen/Hans Haferkamp ( Hg. ) : *Soziologie der sozialen Ungleichheit*. Opladen, pp.346-368
- Gluchowski, Peter. 1987. Lebensstile und Wandel der Wählerschaf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schrift Das Parlament, 21.03.1987* : 18-32.
- Gluchowski, Peter. 1988. *Freizeit und Lebensstile*. Erkrath.
- Hölscher, Barbara. 1998. *Lebensstile durch Werbung?* Opladen.
- Hörning, Karl H. / Michailow, Matthias. 1990. Lebensstil als Vergesellschaftungsform - Zum Wandel von Sozialstruktur und sozialer Integration, in : Peter A. Berger & Stefan Hradil ( Hg. ) : *Lebenslagen, Lebensläufe, Lebensstile, Soziale Welt, Sonderband 7*. Göttingen, pp. 501-521.
- Hradil, Stefan. 1983. Die Ungleichheit der “Sozialen Lage”, in : Reinhard Kreckel ( Hg. ) : *Soziale Ungleichheiten*. Göttingen, pp. 101-120.
- Hradil, Stefan. 1987a. *Sozialstrukturanalyse in einer fortgeschrittenen Gesellschaft - Von Klassen und Schichten zu Lagen und Milieus*. Opladen.
- Hradil, Stefan. 1987b. Die “neuen sozialen Ungleichheiten” - Und wie man mit ihnen ( nicht ) theoretisch zurechtkommt, in : Bernhard Giesen/Hans Haferkamp ( Hg. ) : *Soziologie der sozialen Ungleichheit*. Opladen, pp. 115-145.

- Jagodzinski, Wolfgang / Klein, Markus. 1998. Individualisierungs-  
Konzepte aus individualistischer Perspektive - Ein erster Versuch, in  
das Dickicht der Individualisierungskonzepte einzudringen, in : Jürgen  
Friedrichs ( Hg. ) : *Die Individualisierungs- These*. Opladen, pp. 13-31.
- Jonas, Hans. 1984. *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Frankfurt/M.
- Junge, Matthias. 1998. Subjektivierung der Vergesellschaftung und die  
Moralisierung der Soziologie, in : Jürgen Friedrichs ( Hg. ) : *Die  
Individualisierungs- These*. Opladen, pp. 49-64.
- Kaufmann, Jean-Claude. 1998. Schmutzige Wäsche, in : Ulrich Beck :  
*Kinder der Freiheit*. Frankfurt/M., pp. 217-255.
- Kippele, Flavia. 1998. *Was heisst Individualisierung? Die Antworten  
soziologischer Klassiker*. Opladen.
- König, René. 1979. Gesellschaftliches Bewußtsein und Soziologie, in :  
Günther Lüschen (ed.) : *Deutsche Soziologie seit 1945, Sonderheft  
21/1979 der KZfSS*.
- Kreckel, Reinhard. 1982. Class, Status and Power? Begriffliche  
Grundlagen für eine politische Soziologie der sozialen Ungleichheit,  
*KZfSS ( 34 )*: 617-648.
- Kreckel, Reinhard. 1985. Zentrum und Peripherie - "Alte" und "neue"  
Ungleichheiten in weltgesellschaftlicher Perspektive, in : Hermann  
Strasser/John H. Goldthorpe( Hg. ) : *Die Analyse sozialer Ungleichheit  
- Kontinuität, Erneuerung, Innovation*. Opladen, pp. 307-323.
- Kreckel, Reinhard. 1987. Neue Ungleichheiten und alte Deutungsmuster :  
Über die Kritikresistenz des vertikalen Gesellschaftsmodells, in :  
Bernhard Giesen/Hans Haferkamp ( Hg. ) : *Soziologie der sozialen  
Ungleichheit*. Opladen, pp.93-114.
- Kreckel, Reinhard. 1990. Klassenbegriff und Ungleichheitsforschung, in :  
Peter A. Berger & Stefan Hradil ( Hg. ) : *Lebenslagen, Lebensläufe,  
Lebensstile*, Soziale Welt, Sonderband 7. Göttingen, pp. 51-79.

- Kreckel, Reinhard. 1997. *Politische Soziologie der sozialen Ungleichheit* ( Studienausgabe ) . Frankfurt/M.
- Leisering, Lutz. 1998. Sozialstaat und Individualisierung, in : Jürgen Friedrichs ( Hg. ) : *Die Individualisierungs- These*. Opladen, pp. 65-78.
- Lüdtke, Hartmut. 1990. Lebensstile als Dimension handlungsproduzierter Ungleichheit - Eine Anwendung des Rational-Choice-Ansatzes, in : Peter A. Berger & Stefan Hradil ( Hg. ) : *Lebenslagen, Lebensläufe, Lebensstile*, Soziale Welt, Sonderband 7. Göttingen, pp. 433-454.
- Nassehi, Armin. 1997. Risiko – Zeit – Gesellschaft: Gefahren und Risiken der anderen Moderne, in Toru Hijikata/Armin Nassehi (Hg.): *Riskante Strategien*. Opladen.
- Pollack, Detlef / Pickel, Gert. 1999. Individualisierung und religiöser Wandel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fS* (28-6) : 465-483.
- Schnell, Rainer / Kohler, Ulrich. 1995.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einer Individualisierungsthese am Beispiel der Parteipräferenz von 1953-1992. *KZfSS* ( 47 ) : 634-657.
- Schumpeter, Joseph A. 1953. Die sozialen Klassen im ethnisch-homogenen Milieu, in demselben :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Tübingen, pp. 147-213.
- SINUS (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 Nowak und Sörgel GmbH ) . 1984. *SINUS Lebensweltforschung – Die sozialen Milie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Heidelberg.
- Vorstand der SPD, Bonn. 1984. *Planungsdaten für die Mehrheitsfähigkeit der SPD*. Bonn.
- Weber, Max. 1972.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 Studienausgabe ) . Tübingen.
- Zippelius, Reinhold. 1990. *Geschichte der Staatsideen*<sup>7</sup>. München.